

天津大學簡史

1895-1980



天津大学简史

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

一九八〇年八月



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

(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)



毛泽东主席在校办工厂亲切询问

半工半读的试验情况
(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)

左淑华



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大学讲演

(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)



周恩来总理在天津大学视察
(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)



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大学

(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)

目 录

上编 (1895.10—1949.1)

- 第一章 初创学府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章 始定校训…………… (8)
- 第三章 北洋动荡…………… (16)
- 第四章 颠沛流离…………… (21)
- 第五章 迎接黎明…………… (26)

下编 (1949.1—1980.8)

- 第六章 院系调整…………… (33)
- 第七章 教改试验…………… (43)
- 第八章 整顿提高…………… (52)
- 第九章 文革十年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十章 恢复发展…………… (69)
- 后记…………… (75)

第一章 初创学府

(1895.10~1911)

高等学校，古已有之。但把高等学校称为“大学”，在我国，则还只是清朝末年的事情。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，便是今日天津大学的前身——“天津大学堂”。

天津大学堂是适应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。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，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。帝国主义的入侵促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，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。到十九世纪末叶，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初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这就提出了培养本国高等科学技术人材的客观要求。那时的一些维新派人物也都在向西方寻求真理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努力学习西方，以为靠这些可以救中国。而帝国主义列强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，对文化侵略也不放松，办学校、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种政策的实施。适应上述情形，盛宣怀1892年调任清政府津海关道（注：清朝政府委派的主管天津海关事务的官吏。道，是一种职称）后，即着手研究兴办新学堂，拟请外籍教师专门传授科学技术知识，而不要传播西方宗教和社会学说。中日甲午海战后，办学堂的呼声日高。1895年，他上疏清光绪皇帝载湉，说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才为本。求才之道，尤宜设立学堂为先”，奏请在天津开办一所学堂，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材。此奏获准，

同年10月2日（清光绪二十一年阴历八月十四日）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。清末称我国辽宁、河北、山东等沿海各省为北洋，称南方沿海各省为南洋。南洋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上海，北洋的中心在天津。故此，便将新办之学堂命名为“天津北洋西学学堂”，校址在天津梁家园南围墙外大营门地区。学校创办时，原计划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部，前者为本科，后者为预科。当年成立时，仅有头等学堂，第二年（1896年）增设二等学堂，完成了大学体制，遂更名为“天津大学堂”。天津大学堂名为国立，实际上当时清政府掌管学校教育的礼部和后来的学部均不过问，而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办，经费直接从天津海关税银中拨付。大学堂设督办、总办和总教习各一人。督办为名义校长，首任由盛宣怀兼，盛调离后，沿袭成例，此职均由继任津海关道兼任。总办负责学校一切设施及银钱等各项总务（即总务长），自1897年才实际设立，后又改为督办负责总务。总教习（即教务长）总管学生教师升留辞聘及一切教学事务，实即一校之长。

天津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是美国硕士丁家立（Chas. D. Tenney）。丁1857年生于美国麻省剑桥，大学毕业后进入欧柏林大学研究院，得神学硕士学位，1882年来中国在山西传教四年，后来天津进行文化活动，被盛宣怀聘为天津大学堂总教习。丁家立当时在外侨中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个，办事很有实干精神，在天津大学堂时曾编写过几本教科书，在办学上也是煞费苦心。

天津大学堂的校舍，原是前任津海关道周馥为设立博文书院所建。建成之后，博文书院实际上并没有开办起来，不久周馥也调任离津，其房舍便多年闲置无用。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

学堂成立时，清光绪皇帝批准原博文书院房产为学堂校舍，那时还属于官地。1895年底，这块地皮划入德租界内，天津大学堂仍在原址办学。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京津地区一时成为中心。清朝政府腐败无能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。此间，天津大学堂校舍先为美军所占，后成德军兵营。事后，德帝国主义便蛮横强占，不许天津大学堂于旧址继续办学。天津官方亦曾几次出面交涉，均无济于事。这时，丁家立自告奋勇，利用其外籍身份，迳赴柏林交涉。他根据德国“购地章程”所订之地价房价，为天津大学堂争得五万两白银的赔偿费。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的袁世凯正在天津，当即指定在天津武库废墟重建校舍。

武库废墟座落在天津城北八里西沽村的北面，面积约350亩。此地原是北洋水师训练学堂与军火库处所，义和团运动时被英国侵略者放火烧毁，只剩下了八个库房。1902年开始在武库废墟上兴建新校舍，1903年春，落成两层教学大楼一座，上建着四面钟塔，正门门楼上，高悬着“北洋大学堂”金字扁额，“天津大学堂”旧名遂废止不用。昔日废墟之地，顿成高等学府。校园外，滔滔北运河经旁流过，巍巍桃花堤直接西沽，环境幽静，风景秀丽，一时蔚为名胜。后来的《北洋大学校歌》歌词中曾写道：“花堤蔼蔼，北运滔滔，巍巍学府北洋高”，就是指的此处校址。

新校舍建成后，遂即复课，丁家立继续担任总教习。1906年丁辞职（仍兼北洋大学堂留美学堂监督之职，直至1908年返美），推荐王劭廉接任，改称“教务提调”，北洋大学堂便开始由中国人自己主管。

王劭廉，天津人，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，后又到英国留

学，研究了几年海军，回国后曾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，后又在天津一家英办企业中从事翻译工作。王任北洋大学堂教务提调，在管理方面颇为尽心。此人治校勤恳，办事认真，对规章所定，必严格贯彻始终。尤其是，他对中外籍教师绳之一律，对美籍教师也敢于严格管理，并不姑息宽容。他在任期间，把学校一切假期均按中国习惯重新规定安排，在遵守纪律等方面以身作则，因而颇得中国师生赞誉。他亲自听外籍教师给学生讲课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籍教师，表现出一定的民主作风，因而也为外籍教师所诚服。王劭廉治校时期，北洋大学堂得到整顿，纪律颇为森严，初步形成校风。

天津大学堂时，头等学堂（本科）设法科、土木工程、采矿冶金和机械工程四个科（系）。学制仿美，本科予科均为四年，第一班（届）学生于1899年毕业。北洋大学堂复课后，除机械工程科停办外，其余照旧。学制改仿日本，正科（本科）予科均为三年，一直沿用到1916年（北洋法科1911年首届学生毕业，1920年停办，学制一直是四年）。北洋大学堂新招学生与原来失学回校生皆入予科，三年后再转本科。原天津大学堂第二班，因校舍被占失学，未毕业而星散。北洋大学堂本科接续为第三班、第四班。这两届学生未及毕业便于1906年和1907年由清政府全部送出留学，除三人赴法、一人赴德外，其余全部赴美，留学费用由清政府负担。

1902年时，还曾将设在保定的直隶高等学堂（简称“保高”）作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校，该校毕业生可不经考试而直接升入北洋大学堂本科。到1912年“保高”停办，完全并入北洋大学予科。

自天津大学堂起，学生均是招考。招生地区初为天津、上

海、香港，后又增添广州、汉口、沈阳等地。学生先入予科，后转本科。从1907年起，开始直接招考部分本科学生。工科各系，课程较多。予科以外文和数、理、化为主，另有制图等课。本科前两年开高等数学、测量学、力学、热工学、结构学、地质学、金属工艺学等课，后两年开专业课，范围亦较广泛。学校对学生个人的专业兴趣十分重视，学生入本科一、二年内，还可以要求转系。但考试制度历来严格，升级考试时，差1分不够60分也得补考，主课有一门补考不及格就得留级。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因不及格而降班，甚至退学。

学校自创立起，始终是官费学校，学生食宿均由学校供给，每月另发给每人零用钱白银二两左右。为了鼓励学生读书，还仿书院制举行月考，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以奖赏。由于以上情况，所以学生取自家庭的费用一般较其他学校少些。学生平常每日八小时听讲，晚间三小时自修。因为课程重、作业多，星期日多半还自己读书，很少自由活动。平时专心攻读，无暇他顾，一般不讲究穿戴，衣着比较朴素。到了北洋大学堂时，校址远离闹市区，学生入市内游逛者更是几无所见，唯一的活动，就是课余饭后在桃花堤上散散步而已。

由天津大学堂到北洋大学堂，学校规章制度逐渐完善，校风初步形成，显示了一些特点。概而论之，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：

一是体制仿美。学校专业方向、教学计划等等，均仿美国；课程安排、讲授内容、授课进度、教学用书，皆以当时美国著名之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为蓝图。除汉学（中国语文）外，主要课程全由外籍教师担任（绝大多数是美国教师），一律用英文讲课。就连课堂点名、问答、考试等，亦都用英文。

对汉学课，重在实用，不要求做八股文一类的东西。美籍冶金系教授 Sperry，在北洋大学任教到晚年，对中国学生热情友好，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，受到中国师生们的好评。

二是注重质量。学校课程繁重，要求严格，学生基础牢固，质量较高。在开创时期，学生水平即与美国哈佛、耶鲁大学不相上下；自第一届毕业生起，便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。国内许多有志从事科学技术的青年学生，也常以能考入北洋为荣。随着声誉日高，报考者增多，但北洋大学堂一如既往，始终重质不重量。1907年招考本科学生时，在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广州等地报纸上登招生广告，花掉不少广告费，结果各科考生中仅有一人（报考法科）被认为合格，于是这一年除予科生转本科者外，就只录取了一名新生。

三是讲求实际。北洋大学堂身为理工院校，讲求实际才能，学生有真才实学，毕业后一般均能胜任本专业工作，并有所建树。因此，一直到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大多数毕业生都是在毕业之前即为企业单位所预约，学校也经常把毕业生介绍给需求的单位任职。再加上当时大学毕业生如凤毛麟角，所以毕业后一般无失业现象。在专业设置上，学校也不拘一格，而能随时根据社会需要，增办新班。1898年，受“关内外铁路局”要求，天津大学堂曾附设一个铁路班。1906年，因清政府外交上的需要，北洋大学堂又开办了法文、俄文各一班，培养了一批专门翻译人材。1907年和1908年，为满足中学师资之需求，又开办了两个师范班。

四是纪律森严。丁家立任时期，常到学生宿舍查夜。天津大学堂时，一个冬夜，有学生迟睡闲谈，忽闻脚步声近，顿时手忙脚乱，赶紧熄灯上床，假装已经入睡。丁家立进屋，遍

摸学生之脚，谁脚凉，便是未按时就寝的证据，当即加以训诫。王劭廉在任时期，自己以身作则，不随便旷工，不迟到早退，一时上行下效，不论中外籍教师还是学生，纪律均属严明。学生平时操行纪律，包括在课程考试分数之内，有迟到者，不仅要在门外罚站，还要扣减考分。因此，学生对教师不敢违抗，对校长奉若神明。

上述这一时期，从1895年起到1911年止，前后十六年，是在清朝政府统治之下。这一时期，天津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与肄业生共计379人，其中出国留学学者55人，法文班13人，俄文班14人，师范班69人，余者为各科专门人材。

第二章 始定校训

(1912~1927)

1911年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昌，推翻了清朝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。可是，这次革命最终仍归失败。随后，在军阀混战中成立了北京政府，开始了北洋军阀对全国的统治。

1912年，原北洋大学堂改称“北洋大学校”，直属北京政府教育部，王劭廉继续任职。学校经费仍从天津海关拨发，但须经直隶省财政厅收转，故为直隶省政府控制。因此，北洋大学名义上直属教育部，实际上仍受制于地方军阀。此时，学生也由原来的官费改为自费，但住宿、灯、水，教科书、绘图仪器等，仍由学校无偿供用。

1914年3月，北洋大学校又更名为“国立北洋大学”，大学最高负责人改称“校长”。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总管教学，设学监负责总务。学校改行“货书制”，即学生之教科书和绘图仪器等可向学校借用，用毕若个人愿意留下须交半费，否则便收回交下届学生借用。这时，王劭廉辞职，推荐赵天麟接替。经教育部批准委派，赵天麟便成了国立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。

赵天麟原系北洋大学堂1906年的首批赴美留学生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科毕业后，回母校任教。他任校长期间，提出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训导学生，遂成为“校训”。“实事求是”

一词出之于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》，文中说刘德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。后来被人们沿传引伸，意为：办事求学必须根据实证，求索真相，踏踏实实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赵天麟以这四个字首倡全校，是总结了北洋大学过去的治学传统，从学术观点来看有一定积极作用。但这四个字在当时的涵义，与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所赋予它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有所不同。毛泽东同志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，“实事”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，“是”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“求”就是我们去研究。这里的中心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，理论联系实际。

赵天麟提出了“实事求是”的校训，但他本人并未身体力行。任校长期间，他在教务方面继承了过去的规章制度，但却请了三个美国人为校长室秘书，替他指挥一切。他本人有盲目崇美观念，对美籍教师从不检查过问，任其随心所欲。他自己常把大半时间消耗于租界地和官场中的交际享乐，缺乏认真负责的治校精神。赵天麟任职期间发生了五四运动，北洋大学打破了过去的沉寂，学生们开始参加革命运动。

北洋军阀对教育事业本无兴趣，可是对学生的政治活动却严加控制。1910年，为了实行立宪请开国会，各地学生纷纷集会，上书请愿。直隶总督则派兵将北洋大学堂包围，禁止学生出校，声言免被“坏学生”勾引，做出“不轨行动”。于是，北洋大学堂的学生便未能参加这次行动。1914年，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“二十一条”，北洋大学也随各校学生向北京政府作了呼吁，但由于校方严加监视，这次也没有形成集体行动。可是，当五四运动如同火山爆发一样震动全国时，北洋军阀就再也压制不住北洋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了。